

| 文物故事

六十四 个孔洞：胜利的刻度

■ 於娅娅

一条长128厘米的皮带，为何密密麻麻打上64个窟窿眼？

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抗美援朝展厅里，有一条旧皮带，被它的主人——志愿军某部机械连战士李景禄，开发出了新的功能：记录冷枪杀敌的数量。

冷枪杀敌，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战士结合实际创造的新战术。1951年，战局转入两军对垒的阵地战阶段。这种长期对峙，对炮兵火力密度和射程不占优势的志愿军来说很不利。于是，他们创造了一种以单枪或单炮对敌守备人员进行射杀的战术，隐蔽性强、机动性高，俗称“打冷枪”。

| 睹物思今

皮带上的孔洞还在“增加”

■ 陆军某试验训练基地高级工程师 王 栋

第一次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看到李景禄的皮带时，我停留了很久，对这名眼里只有任务、心中只有胜利的忠诚战士充满敬意。刺刀作笔，皮带为纸，生命为墨，这位未曾留下一张照片的英雄，用朴素却悲壮的方式告诉后人，什么是“最可爱的人”。

讲解员从英雄来不及刻下的7个孔洞说起，为我们介绍了李景禄在战场上的一个个“高光时刻”。脑海中，呼啸的子弹脱膛而出，敌人应声倒地，也“击中”了我——作为一名工程师，我和野战部队官兵相比，战场冲锋的机会较少，但迈入军营，我们都像一颗颗上膛的子弹，国家利益所向就是前行的方向。

10多年来，我参加作战试验任务百余次，渐渐养成了个习惯：从不同试验场地带回一块石头。它们就像记忆的开关，经历的见证，更像情感的寄托、心境的投射，每次看到，都会让我想起背后的故事。戈壁、荒漠、高原、岛礁……我曾在不同地形、不同环境，淬炼着武器装备性能，也磨炼着自身的血性本领。

李景禄皮带上的孔洞，记录着他杀敌的经历；我从试验场地带回的石头，记录着我走过的路。

第一块带回的石头形似子弹，一端尖锐、一端平齐。那是十几年前，我们收到陆军某部官兵的反馈：某型装甲车各项指标都合格，进入实战编组后却“水土不服”，达不到预期效果。我带着团队来到戈壁深处，进行某作战体系检验，发现是前方战车扬起的沙尘短时间内堵塞了后车进气口，导致难以发挥装备性能。

“冷枪冷炮”运动前，敌人一度十分嚣张，白天也敢三五成群地晒太阳、打扑克，仿佛把别人的国土当成了自家后院。冷枪战全面铺开，战士们总结出了一套规律：敌人吃饭、看轰炸、修工事的时候最好下手，一打一个准，直打得敌人整天蹲在阵地里不敢露头。仅1952年5月至8月，志愿军便歼敌1.3万余人，阵地上流传的一首歌便唱出了这样的场景：“冷枪战，冷枪战，冷枪打得敌胆寒。你也打来我也打，今天俩，明天仨，加起来就是一个歼灭战！”

就是在那时，战士李景禄也扛起步枪，加入了冷枪杀敌的行列。

对一名狙击手来说，每一枪都关乎生死。白天，他潜伏在掩体后，盯着随时会露头的敌人，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杀敌；夜晚可能遭遇炮击，需随时转移阵地。枪林弹雨中，如何记录战果？李景禄低头看了看腰间那条二指多宽、一米多长的旧皮带，想到了办法：每击毙一名敌人，就用刺刀在皮带上钻一个孔。从此，这条皮带变成了一个“计数器”，一本“生死簿”。每次击毙敌人后，李景禄就迅速隐蔽、转移位置，因为枪声一响，敌人的炮火很快会覆盖过来。他在转移的间隙，争分夺秒地抽出刺刀，在皮带上用力钻下一个孔。

皮带上的孔一天比一天密集。第1个、第10个、第50个……每一个孔都是胜利的刻度，都意味着阵地前的敌人少了一个，身边战友们的安全多了一分。孔洞边缘，那因仓促刻划留下的毛刺和深浅不一的刀痕，就像凝固在牛皮上的一声声急促呼吸。

据战友回忆，李景禄最后一次作战，又消灭了7个敌人，但呼啸而至的炮弹没有给他留下记录的时间——他来不及撤离，光荣牺牲。

1953年，志愿军政治部在朝鲜举办展览时征集到这条皮带。1959年，它被移交至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。

如今，这条皮带作为国家一级文物，在玻璃展柜内向每一名参观者讲述那段历史。留下的64个孔洞，定格了64个荣誉瞬间；没能留下的7个孔洞，记录了这名普通战士的生命绝唱：战斗到最后一刻！

下图：志愿军某部机械连战士李景禄用来记录冷枪杀敌数量的皮带。

资料图片



资料图片



沙地上，熄火的装甲车沉默着，战士们站在车旁。时至今日，我都忘不了那一刻的感受：他们什么都没带，眼神却像针一般扎在我心头。

我蹲在装备进气口前整理思绪，发现了那颗石头。它仿佛提醒着我，别做一颗哑弹，看似威力大，却引爆不了。

后来，我和战友不断探索新的试验理论方法，健全完善作战试验体系，不让任何细微的偏差影响判定装备性能。

那年，陆军某旅首次承接高原联合作战试验任务，我被邀请作为试验专家带队支援。为了充分验证装备体系效能，我三上三下高原，和团队连续奋战3个多月，反复修改试验方案。最终，任务顺利开展，圆满达成既定目标。团队得到上级高度肯定，还收到该旅寄来的感谢信。

任务总结讲评结束后，我走出帐篷，看到金辉在雪山之巅绽放，照亮了我，也照亮了用石块堆起的一座玛尼堆。我捡起了附近的一块石头——它标记了战场的海拔，是我给自己的一枚勋章。

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那条皮带上的孔停止了计数，我捡回的石头还在增加。为了胜利、为了打赢，革命先辈长眠疆场，我们要沿着他们的脚步，带着必胜的信念继续奋斗下去，让那条皮带上的孔洞不断在“增加”。

（王晨辉整理）

文物会说话

光影时空

| 瞬 间

图①：在抗美援朝战场上，一名志愿军战士轻伤不下火线，顽强阻击敌人。

资料图片

图②：2019年的一次训练中，武警重庆总队某训练基地一名战士磨破了手上的皮，并没有退缩，仍然在等待下一次冲锋。

资料图片



| 点 睛

军人的特殊“勋章”

与伤痛为伴、携伤疤同行，是军人的常态——战争年代，军人面对枪林弹雨、炮火硝烟，随时可能流血牺牲；平时时期，官兵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，受伤也是家常便饭。

一道道蜿蜒的伤痕，往往铭刻着一场与死神擦肩的较量，一次挺身而出的无畏，一份用生命守护的誓言。但



无论伤有多痛，那交错着血泡的双手，依然能紧握钢枪；那层叠着淤青的双腿，依然能奋勇冲锋；那饱经过伤痛的身躯，依然能抵御风雨。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为谁受伤、为何受伤，更知道伤口愈合之后，会生成更为坚韧的肌理，会化作伴随一生的特殊“勋章”。

（臧乾雯）

“好传统”故事会

讲 述 者 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四支队某中队战士 李 勇

聆 听 者 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四支队官兵

神兵名叫“云贵川”

提起“云贵川”，大家第一反应是地名的缩写。但我今天讲的“云贵川”，是长征途中一名十六七岁苗族战士的名字。他入伍时没有名字，只因跟着红军走过云南、贵州、四川，便被亲切地称为“云贵川”。

1935年9月，红军走出了荒无人烟的大草地，被堵在了天险腊子口。两侧绝壁刀削斧劈，中间仅有一座小木桥，敌军碉堡死死封住桥面。

有一年，美国记者哈里森·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，在其作品《长征——前所未闻的故事》中对腊子口惊叹不已：今天任何一个能亲眼看到腊子口的

都会认为，这个据点是牢不可摧的。尤其是红军强渡大渡河、飞夺泸定桥，让敌人震惊和意外，也让他们加强了对腊子口的守卫。

正面久攻不下，唯一的“破绽”是攀上侧面的百米悬崖，从顶部炸毁碉堡。可那悬崖，连鸟都站不住脚，怎么上？

“我能上！”人群中站出一个瘦小的战士，“给我一根带铁钩的长竿，我就能钩住崖缝爬上去。”他就是“云贵川”。比起其他战友，从小在深山采药打柴的他更熟悉悬崖。

“云贵川”像一只山间的岩羊——身体紧贴着那面近乎垂直的石壁，用手

指去探每一道崖缝，摸索到一处微小的凸起或裂隙，便把铁钩挂上去，咬紧牙关把身体一点点往上拉。

石壁上满是锋利的棱角，将他的手掌割开数道口子，鲜血顺着指缝渗出来。山风呼啸着灌进峡谷，吹得他身体微微晃动，脚下的岩石也松动了，碎石哗啦啦滚落，人差点跟着摔下来，可他的手指死死地钉在百丈绝壁上。

那是怎样的手指啊，指甲劈裂了，指甲缝里是碎石和血泥，指关节的皮肉早已磨破。终于，那根沾染鲜血的长绳从山顶抛了下来。

突击队借着夜色攀上崖顶，总攻的

信号弹划破夜空。可悬崖太高、树枝太密，扔出去的手榴弹被挡住，敌人的碉堡疯狂地喷吐着火舌。

敌人的增援在逼近，包围圈在收紧。“云贵川”眼中充满决然，把手榴弹一枚枚绑在腰间，又抱起一捆沉甸甸的炸药，朝着碉堡纵身一跃。瘦小的身影划过天空，无情的子弹穿膛而过，那一瞬，时间仿佛定格了。

战友们撕心裂肺地喊他的名字，可他已经听不见了。他像一只折断了翅膀的山鹰，拖着那道触目惊心的血线，在夜空中翻滚、坠落，砸向地面。

“轰——”一声巨响震彻山谷，“云贵川”永远融入那片烈火中。他用自己的生命，为千军万马撞开一扇生的大门。攻下腊子口后，红二师政委肖华题诗：“绝壁巍峨挡不住，神兵飞下万重山。”

十六七岁正值最美青春年华，但“云贵川”与硝烟为伍，与风险为伴，最后连真名、照片、墓碑都没有留下。他短暂的一生就像一颗流星，可那尾焰从未熄灭——它融进了我们战备执勤的身躯，融进了我们奔赴疆场的脚步……

（曹伟整理）

“军号不只是乐器，更是武器”

■ 谢应月

传承进行时

暮色笼罩营区，操场上飘起断断续续的号声。几个音符跑了调，在风里晃悠悠。

西藏军区某旅一级上士孙凯伦站在新兵孙浩天旁边，听了一遍，没吭声，凑过去把他握号的手往上抬了抬，退后半步，又听。

放下号，孙浩天感觉腮帮子酸得合不拢。他拿手背蹭了一下嘴角，问声说：“队长，我当兵是想上战场，不想天天练吹号。”

“军号不只是乐器，更是武器。”孙凯伦手指摩挲着号身，讲起抗美援朝战场上那位名叫郑起的司号员——

1951年1月，釜谷里。郑起所在的志愿军第39军某团7连奉命坚守阵地，

几番激战，班以上干部全部牺牲。连长厉风堂倒在血泊中，将自己的手枪与牢牢守住阵地的任务，一起托付给了郑起。

阵地上只剩7名战士，山下再次响起枪声，郑起知道，这次只能拼死一战了！把仅有的一根爆破筒和几枚手榴弹投向敌人后，郑起爬出战壕，用尽全力吹响军号。这突然响起的嘹亮号声，让冲上来的敌军误以为我军大部队已经赶到，慌乱中掉头向山下逃窜。

阵地，守住了。郑起后来才知道，那支敌军参加过诺曼底登陆，以擅长打阵地战而闻名。美国陆军上将李奇微在回忆录里描述，军号“是一种铜制的乐器，能发出一种特别刺耳的声音……只要它一响起，共产党军队就如着了魔法一般，全部要命地扑向联军，每当这时，联军总被打得如潮水般溃退”。

“其实哪有什么魔法，只不过军号吹出来的不是音调，而是军令，是一支军队

宁死不退的魂。”孙凯伦把军号递回孙浩天手里，又道，“其实不光是抗美援朝时期，更早的时候，军号就能配合战术发挥作用。”

1939年冬天，八路军某团在松山镇与日伪军激战。由于兵力悬殊，团长便将司号员分成两人一组，分散埋伏在镇子四周。总攻发起后，每个方向都响起了冲锋号，日军以为被重兵包围，慌乱四面扫射。火力一散，八路军乘势而上……

“吹响号角的时刻，便是整装出击的时刻，勇往直前的时刻，夺取胜利的时刻。”孙浩天握紧手中的号，觉得沉甸甸的。

强渡大渡河时，张生荣等几十个司号员一齐吹响冲锋号，激励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、顶着急流险浪，奋不顾身冲上对岸，占领渡口；抗战时期，为了保卫敌后建立的最大武器弹药生产基地——黄崖洞兵工厂，司号员崔振芳一次次吹响

军号，接替牺牲的战友投出了100多枚手榴弹，最终牺牲……越了解革命先辈的故事，孙浩天越感到，军号让号令意识有了“活的载体”，只要嘹亮的号声在阵地上响起，便是最有力的鼓动，伤了的胳膊，好似能拔山填海；折了的刀剑，也可以切云断虹……

余音不绝，必有回响；血脉不断，自有来人。此刻，操场又传来号声，仔细聆听，和几十年前来自釜谷里、松山镇、大渡河、黄崖洞的，是同一种声音。

